

# 《中国印刷史》英译纪略

陈 芙<sup>1</sup>, 陈洁华<sup>2</sup>

(1. 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杭州 310018; 2. 上海出版印刷专科学校基础部, 上海 200093)

**摘 要:**《中国印刷史》英文版入选 2009 年法兰克福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重点图书翻译出版资助项目。以该著作的英译工作为出发点,探讨在“中国出版走出去”战略指导下中译外工作的重要性,以及中国翻译工作者弘扬祖国文化的重大责任。具体分析了为尊重原文的文化身份,翻译汉语典籍和专著时应采取的策略和方法。

**关键词:** 中国印刷史; 中译外; 文化身份; 异化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 0 引 言

2009年10月16日,由美国海马图书公司和浙江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英译本《中国印刷史》,在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中向全球首发。值此顺利完成国家任务之际,掩卷回顾翻译过程,感触颇深。作为项目组成员,深感有必要对翻译过程做个分析和总结。

《中国印刷史》(张秀民著,韩琦增订)是印刷史学界一部划时代的学术巨著。张秀民先生自厦门大学就读时起即开始积累资料、钻研印刷史,至耄耋之年仍皓首穷经,埋头写作。该书是他毕生心血和学识的结晶。这部著作出版后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是一部份量极重、荣誉极高的学术专著。这部专史系统详细地论述了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起源、发明和发展的历史。印刷史同时也是书籍史,而书籍象征着文化的积累和传承,因此该论著更是以中国印刷史为主线的一部中华文明史,将之译入外语,对弘扬中华文化无疑具有重要意义。2008年,该书的英译工作被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确定为2009年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重点图书翻译出版资助项目,是国家指定必须完成的“中国出版走出去”和“中国文化走出去”重点项目之一。

## 1 “走出去”与译者的责任

2008年5月,《中国印刷史》英译工作正式启动。该项目肩负国家战略和原著盛名的双重压力,时间也非常紧迫,数十万字的翻译工作要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全部完成,翻译工作的难度非常大。主要难点有三:首先,原著文白夹杂,包含很多出自古文和外文著作的引语,而且专业性强,对于并不通晓印刷术、版本目录学和历史学的译者来说正确理解原文就是一大难点;其二,书中使用了繁多的古今中外的造纸、印刷、版本、目录、历史、考据等多学科专业术语,涉及数以千计的汉语、日语、朝鲜语、越南喃字、梵文、英语、法语等的人名、书名、官职机构名及其它专有名词,这些专名都要本着翻译学中“名从主人”的原则,一一找到对应的英译,因此多语种的译“名”是又一大难点;其三,由于是五位译者合作翻译,为保证全书的整体性和连贯性,要做到众多术语和名词翻译前后统一,格式一致,这也是非常棘手的问题。面对如此巨大的挑战,我们犹豫再

三最终还是接受了此项艰巨的任务。这主要因为该书的英译是一次难得的实践机会,更因为中译外工作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内容,将代表中华文化主流的典籍与专著译介出去,是身为翻译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进入20世纪以来,世界格局风云变幻。伴随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语言与文化的势力角逐同样非常激烈。国家有强弱之分,相应地,语言和文化在话语权的明争暗斗中也从来没有平起平坐过。如今,英语的强势地位显得越来越咄咄逼人。以互联网为例,据科学家对全球网页信息的调查,英文信息约占95%<sup>[1]</sup>。这种以语言为媒介,以网络为载体的信息垄断,不啻为一种新型的文化帝国主义,此种软侵略正在成为国际社会的新威胁。据联合国调查,全世界仍有几千种语言未能跻身网络空间,全球化进程和互联网发展加速了弱势语言的消失。据专家预测,200年后,世界上现存语言中的80%将永远消失。语言灭绝的速度甚至超过物种的灭绝。语言和文化是相互依存的,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先生曾指出:“每两个星期就会有一种语言从世界上消失。随着这一语言的消失,与之相关的传统、创造、思考、历史和文化也都不复存在。”<sup>[2]</sup>因此,语言多样性与文化多元性密不可分。保护文化生态平衡已经迫在眉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关于文化多元性的全球宣言(UNESCO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中指出“人类文化的多元性犹如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一样必要”。单一的世界是乏味的,多元的世界则是丰富多彩的,因此保护多元文化就是保护人类的精神家园。

保护弱势语言,对抗强势语言的话语垄断,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弱势语言和文化自我言说。“作为弱势的第三世界,如果在言说自我的同时还举棋不定,那么,作为强势的第一世界,是不会主动把你推到‘中心’甚至‘平等’的位置的。”<sup>[3]</sup>而这种自我言说,自然离不开译介。翻译是一种语言和文化走向国际舞台的必由之路,没有翻译,文化就如同患了失语症。要向全世界发出本民族的声音,就需要借助译介使自己“走出去”。因此,2004年国际翻译日的主题就被定名为“多语并存与文化多元性”。

在这样迫切的全球局势下,已经呈现强势趋向的汉语言文化也一样必须主动地“走出去”。

我们的母语——汉语无疑是伟大的语言。世界上找不出第二种能与汉语顽强的生命力相媲美的语言。现代的中国小学生依然能琅琅上口地背诵2500多年前的《论语》,不能不说是语言奇迹。汉语堪称语言中的“活化石”,而且是现存语言中唯一的非拼音文字。保护我们伟大的母语,让全世界聆听汉语言文化的声音,必须借助中译外工作。通过中译外工作来宣传汉语言文化,中国译者责无旁贷。

如今,中译外的重要性已得到各界的充分认同,被认为是战略性、全国性的任务。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蔡武在2007年“中译外——中国走向世界之路”高层论坛上指出:“中国五千年悠久而璀璨的历史文化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中国理应对新世纪新文化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而要承担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中译外翻译工作任重而道远。”

中国文化走出去和中国出版走出去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宏观战略,在当今的国内外形势下,中译外工作迫切而重要。《中国印刷史》英译工作只是整个中译外工作中的沧海一粟,但无论多浩瀚的海洋也是由点滴之水汇聚而成的。要将浩如烟海的中文典籍译入外语,需要翻译工作者共同努力,从点滴做起,通过中译外工作,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关注悠久而灿烂的中华文化。《中国印刷史》是第一部中国学者撰写的关于这项被称作“文明之母”(Mother of Civilization)的伟大发明的全史,为弘扬中华文化,十分有必要将之译入外语。译入语最好为译者的母语,这是译界不成文的规则,但是汉语目前仍处于相对弱势的境地,中国的典籍、专著不可能全部指望外国译者来翻译,将它们译入英语及其它语言是中国译者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才明知力有不逮,但仍勉力为之,承担起该书的英译工作。

## 2 《中国印刷史》英译概述

### 2.1 参透原文,避免误译

《中国印刷史》初译稿费时半年得以完成,其后又经历大半年时间对译文进行了先后四次全面审查和修订,总共历时15个月完成全部翻译工作。在一次次讨论推敲和字斟句酌之后,我们深刻体会到翻译此类贯通古今的专史著作的艰巨。为避免造成意义损失或扭曲,最大限度保留原文的文化特色,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必须勤于查阅与咨询,确保正确理解原文;二是必须谨慎处理专名和术语,要充分考虑这些词语隐含的

文化和历史背景,并权衡保留原语特色和适应译入语表达习惯之间的关系。

苏珊·巴斯内特说:“A writer does not just write in a vacuum”<sup>[4]</sup>,因此任何一个文本都与文字之外的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性。正确理解原文,不仅需要扎实的语言功底,更需要文字之外丰富的百科知识。善解“文”意是译者必备的基本素质,也是需要日积月累的职业素养。翻译专业性强、涉及知识面广泛的专史著作,文字之间处处都隐藏着可能造成译者误解的“陷阱”,稍一疏忽就可能导致错会文意。《中国印刷史》中此类例子比比皆是。例如,书中多次提到“正统道藏”,其中“正统”二字,很容易理解为“正宗”,其实此处的“正统”是明朝的年号,而“正统道藏”就是正统年间编纂的官修道藏,是中国道教史上重要经典之一。在论及明朝铜活字印刷时,书中引用了唐锦《龙江梦余录》(弘治十七年刻本)中的一句:“近时大家多铸活字铜印,颇便于用。”稍不留神,就会把此处的“大家”按照现代汉语理解为泛指代词,实际上此句中“大家”是指世家望族。又如,书中赞美宋刻《汉书》的珍贵,称“钱谦益以千二百金购之,成为稀世之珍”,这里的“千二百金”貌似指一千二百两黄金,但查阅钱谦益收藏《汉书》的相关史料后得知“千二百金”是一千二百两白银,而非黄金。《中国印刷史》中谈到的古代纸张品种非常多,其中一种叫“棉纸”,乍一看会以为是棉花制成的纸张,但其实这种纸是以麻或树木的韧皮纤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之所以称为棉纸,是因为它的纤维细长,柔韧如棉,因此不宜译成“cotton paper”。再如,在介绍各个朝代的版本特色时,经常提到“页”,如“全书六万九千字只用十五页”,如果不加个心眼,这个“页”就容易译成“page”,但其实中国古书的一“页”中间是版心,两边是个有半“页”的文字或图画,不同于现代洋装书,中国古书的一“页”,大致相当于洋装书的两个“page”,所以应译为“leaf”。在分析雕版印刷的起源时,作者提到“景元大德刊本”《北史》,这个词语颇费解,尤其是“景”字,后来咨询了作者韩琦博士,才弄清这个“景”字是“影”的通假字,也就是影印的元朝大德版《北史》。类似导致误解的情况在《中国印刷史》英译过程中时常遇到,虽然我们在翻译时已经倍加小心,但仍然在译稿的数次检查中找出了不少因为理解错误导致的误译。其中一些错误是才疏学浅所致,要避免绝非一朝一夕的修为可以做到;而有些则是翻译时不假思索或不求甚解的结果,每每发现这类错误时,犹如芒刺在背,因为这些是多加小心、多花心思本可以避免的。

相对于整本《中国印刷史》,上述几例仅仅是九牛一毛,但也足以说明此类专史著作对译者的理解能力是很大的考验。误解必然导致误译,因此准确理解原文是译者首先要攻克的难关。为避免误解,译者需要具有判断文字多义、歧义、隐讳、双关、通假、典故等等的敏感性,善于揣摩文字背后的文化内涵,并切忌想当然,时刻保持存疑的态度,遇到不确定的地方,要勤于查阅资料或请教专家,深究下去,直到确定准确掌握其含义为止。

## 2.2 文化身份与翻译策略

语言与文化相互依托,相辅相成,因此翻译活动不仅是跨语言交流,更是跨文化交流。一个文本从翻译伊始,托付给译者的就不仅仅是文字,还有文字中蕴藏的文化内涵。在全新的译入语语言体系中,译者需要代为言说的不仅是原文本和作者,更有原语与原语文化。译者对待原文本的文化心态和所采取的翻译策略,直接影响原语文化在译本中的命运。译者应该如何对待原语文化,这是个古往今来争论不休的问题,古代佛经翻译的文质之争、近现代的硬译与顺译、直译与意译,以及归化与异化译法的论战,其实都是围绕着如何处理原文本以及原语文化中的异质成分这个核心论题展开的。

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运用解构主义的哲学思维分析翻译的核心问题,如翻译的本质、原文本与译本的关系等,将翻译学研究引入全新视角。德里达提出“延异”(differance)的概念,指出翻译的目的不是为了求同,而恰恰是为了存异。解构主义理论指出“翻译最能揭示出语言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sup>[5]</sup>,强调通过存异,在翻译中体现各民族语言文化间的平等关系。解构主义译论的另一位领军人物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他的著作《译者的隐身》中声明他撰著的最终目的是“to force translators and their readers to reflect on the ethnocentric violence of translation and hence to write and read translated texts in ways that seek to recognize th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difference of foreign texts”<sup>[6]</sup>。韦努蒂认为译者和读者均应意识到种族优越感对翻译的影响,译文应尽可能多地让译入语读者认识原文本所具有的异域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性。

我国古代伟大的翻译家玄奘在翻译梵文佛经时,非常郑重严谨,为尽量避免造成意义损失,他曾制定了

“五不翻”(玄奘所谓“不翻”是指译其音,不译其意)原则<sup>[7]</sup>,即:

- a) 秘密故,如“陀罗尼”;
- b) 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
- c) 无此故,如“阎浮”树,中夏实无此木;
- d) 顺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
- e) 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

此五种玄奘认为宜直接采用音译的情况,和解构主义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五不翻”原则和异化译法的出发点相同,都是为了充分尊重并尽可能保留原文本的“异”,有“异”则存之,而不是视而不见或轻率地将其同化。由此可见,古今中外的译界都认为如何对待原文本的异质成分直接关系到原语与原语文化身份是否得到尊重,是翻译中立场性和策略性的问题。“五不翻”原则提到的五种情况,除第一种和第五种为宗教经书翻译特有之外,其余三种对汉语典籍和专著中的术语和专有名词等的翻译都具有高度的借鉴意义。

《中国印刷史》的英译主要采用韦努蒂倡导的异化译法,“leaves the author in peac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moves the reader towards him”<sup>[8]</sup>。异化译法紧贴原文,尽量保留原文的语言习惯和修辞手法,充分尊重原文的文化特色。采用异化译法,可以保留原文的异质成分,使原语文化特色和文化身份在译入语中得到最大限度的体现,并让译入语读者有机会接触和了解文化他体(culture other)。“异化译法既是文化沟通的手段,也是各文化彰显个性和特色,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占领自己的地位的重要途径。在这一点上,异化译法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提出的关于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倡议。”<sup>[9]</sup>

在《中国印刷史》的英译本中,异化策略集中体现于术语和专名的翻译上。该书包含大量中国古代造纸、印刷、出版等方面的术语,并涉及很多古今中外各类专有名词,是全书文化负载和学术含量最厚重的部分。传统术语和此类专名大都带有很深的文化烙印,属于文化标志性词语,在处理这些术语和专名时,我们多采用拼音加注解的方式,以求最大限度保留其文化特质。玄奘总结的“五不翻”原则中的第(b)、(c)、(d)条在该书英译中,尤其是处理术语和专名时,被频繁采用,下面略举几例逐一予以说明。

#### a) “含多义故”

一个术语或专名如果含义不止一个,在译入语中往往很难找到可以以一概全的对应语。《中国印刷史》中不乏这样的例子。如中国古代的官职、机构名称与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由于历朝历代的官制体系一直在沿革变化中,同一个官职或机构在不同的朝代其品级、职权和管辖范围有时不尽相同。如“内府”,基本上指皇家仓库,但从秦至清,“内府”这个机构的所辖和所属存在着差异,该词即“含多义”。再如“国子监”、“太守”、“巡抚”等也是如此。为了减少意义损失和偏差,类似的古代官职、机构名称一律采用拼音,并在第一次出现时加注。英文注解主要参照目前国际上最权威的中国古代官制辞典 *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 (Charles O. Hucker 编纂),并注意朝代差别,在每个朝代第一次出现该官职或机构名时给出相应注解。例如,宋代部分第一次提到“内府”时给的注释是“Palace Storehouse Supervised by the Court of the Imperial Treasury”,而清朝的则是“Office of the Palace Treasury”。

#### b) “无此故”

《中国印刷史》中术语和专名数量繁多,主要为我国古代印刷出版行业或历史文化特有的词语。如上述的官职、机构名称,其实除了“含多义”,在英语中还没有对应语,因此也属“无此”,所以用拼音加注是妥贴的译法。很多印刷出版相关的术语,也基本是汉语所特有,在英语中找不到对应语。比如“经”、“史”、“子”、“集”四部,在英文中很难找到完全对应的词语来一一概括这四部所包括的所有文本类别,为了避免以偏概全,也采用拼音音译。第一次出现时附了脚注,说明四部各自涵盖的类别,以后再出现就直接用拼音,这样既能尽量保全原文的意义,又使译文简洁。又如中国古代图书的“卷”,不能简单地译成“volume”,因为“卷”指册本或篇章,概念并不等同于“volume”,“volume”相当于“册”,因此我们用拼音斜体的格式翻译“卷”,第一次出现加了夹注:“chapter-like divis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books”。这类汉语言文化特有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在《中国印刷史》中不胜枚举,有时短短一段话,就能找到数个,请看下例:

称《磻砂藏》,共五百九十一函,始“天”字终“烦”字,一千五百三十二种,六千三百六十二卷。半页六行,行十七字,折装本。

It was said that *Qisha zang (Tripitaka)* contained 591 cases of sutras, numbered in Chinese characters from *tian* (“天” is the first character in *The Thousand-character Classics* and means “number one” in cataloguing) to *fan* (“烦” is the 591<sup>st</sup> character in *The Thousand-character Classics* and means “591<sup>st</sup>” in cataloguing). There were altogether 6,362 *juan* of sutras under 1,532 *titles*, with six lines on half a *leaf* and seventeen characters in each line (in sutra folded binding).

上例中加了着重号的部分都是具有汉文化特点的词语或表达方式,除了已经谈到的“页”和“卷”,还有“种”(我国古书的“种”不等于英文的“kind”,一种书是指一个书名下的卷帙,因此译为“title”)和古代依《千字文》编号的习惯。译文充分注意了这些文化特质。对我国特有的编号方式,没有简单地直接转换成数字编号,而是尽量予以保留,同时为了方便译入语读者理解,对汉字编号方式做了较详细的夹注。

### c)“顺古故”

所谓“顺古”,就是依照约定俗成的惯用译法。对学术专著的翻译来说,术语的处理是一大难点,因为所有术语都要落实其在译入语中的对应语,不能依照字面想当然地翻译。《中国印刷史》中出版印刷方面的术语很多,而译者并非该领域的专家,要做到所有术语的翻译都有凭有据,符合学术惯例,实非易事。好在有众多专家学者的慷慨相助,我们才得以明确绝大多数重要术语目前学界最通用的英译。如:

卷轴装——scroll and rod binding;

拱版——embossed blocks;

磁版——enamelware type;

套印——multi-block printing;

制书——imperially authored edition.

除了术语,专有名词也需要参照惯例,采用惯用译法。如“陕西”,通用的译法是“Shannxi”,为了区别山西的英译,多了一个“n”。又如书中提到了陈嘉庚、孙中山、佛山邓姓印工等人,依据“名从主人”的原则,或采用已经为英语国家读者熟悉的译法,分别译为:“Tan Kah Kee”、“Sun Yat-sen”、“a Printer Named Tang in Foshan”。

但顺古必先知古,这要求译者博学广识,成为“walking encyclopaedia”,并能充分了解原语和译入语语言文化中约定俗成的习惯和学术惯例,这是翻译的又一难点。

典籍和专著翻译中,原文的理解、术语和专名的翻译可谓困难重重,难怪严复感叹:“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一项工作的重要性和它的难度往往成正比。始终站在人类文化交流的最前沿推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译者,担当着“文化使者”这一光荣使命,理应付出不同寻常的努力。为言说祖国的灿烂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在翻译汉语典籍和专著时,做到严谨认真、一丝不苟,更应是在所不辞的。

## 3 结 语

由于存在诸多难点,而且时间仓促,《中国印刷史》英译工作注定是非常困难、紧张而艰苦的过程。张老在该书前言中说撰写这部著作是“蚊力负山”,体现了作者谦逊的风格,但这个成语用在我们的翻译上却很贴切。我们缺乏印刷史、版本学和目录学等相关专业知识,古文、国学及史学功底也可谓捉襟见肘,这使翻译工作难上加难。为了不辱使命,我们只能加倍费神,加倍仔细。《红楼梦》第三十回里贾宝玉曾为情感言“我的五脏都揉碎了”,我们在翻译此书的一年多时间里,为一词一句推敲踟蹰、费尽心思的情状也大致抵得上这一声感叹了。此次英译工作十分辛苦,但辛苦得来的收获也是分外甘甜的。《中国印刷史》英文版在法兰克福书展前如期付梓,并在书展期间举行了该英文版的全球首发式,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悠久而璀璨的印刷史。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作为译者,我们为弘扬祖国文化尽了绵薄之力。但最大的收获还是在翻译的过程中,纽马克说:“Translation is enjoyable as a process, not as a state”<sup>[10]</sup>,此言不虚。通过此次译事,我们增长了印刷史学和国学知识,锻炼了语言和翻译技能,得到了诸多专家的指点和教益,并有幸通过此次译事结识了不少良师益友。西班牙大哲学家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这样形容翻译的甘苦:“Splendours and miseries of translation”<sup>[10]</sup>,个中滋味,恐怕唯有亲历亲为的译者方能深切体会。

**参考文献:**

- [1] 黄月胜. 论西方网络文化的强势传播与影响[J]. 江西社会科学, 2005(6): 155-158.
- [2] 布特罗斯·加利. 世界化的民主化进程[M]. 张小明, 许 钧,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163.
- [3] 柳 林. 后殖民翻译研究的中国话语[J]. 中国翻译, 2007(3): 26-29.
- [4] Bassnett Susan, Lefevere A.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C].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136.
- [5] 郭建中. 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187.
- [6] 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41.
- [7] 马祖毅. 中国翻译简史[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8(6): 66.
- [8] Schuttleworth M, Cowie M.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59.
- [9] 陈 芙. 汉语成语英译的异化与归化译法分析[J].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 2006(3): 374-379.
- [10] Newmark P.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225.

## Splendours and Miseries

###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History of Printing*

CHEN Fu<sup>1</sup>, CHEN Jie-hua<sup>2</sup>

-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2. Department of Basic Courses, Shanghai Publishing and Printing College,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The completion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rinting* was selected as one of the key items of the China Book International (CBI) project in 2008, with the English version being exhibited in the Frankfurt Book Fair in October, 2009, where China is the Guest of Honor. The significance of translation out of Chinese is discussed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Chinese translators is emphasized when introducing the translation work of this treatise. The strategies and methods of translating Chinese classics and treatises are also analyzed, in the sense of keeping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source text.

**Key word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rinting*; translation out of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foreignization

(责任编辑: 马春晓)